

刘荣平 校注

赌棋山庄词话校注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2007.23
2007

-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08B112)
- 厦门大学“985工程”人文优势学科项目资助成果

赌棋山庄词话校注

刘荣平
校注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赌棋山庄词话校注/刘荣平校注.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615-4685-7

I. ①赌… II. ①刘… III. ①词话-作品集-中国-清代②《赌棋山庄词话》-注释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2202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xmupress.com

沙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32.25 插页:2

字数:596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定价:8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前言

谢章铤(1820—1903),字枚如,福建长乐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中副车(副榜贡生),同治四年(1865)中举人,光绪二年(1876)应礼部试,次年举进士,授中书舍人,随即挂冠归讲江西白鹿洞书院,后主讲福州致用书院讲席13年。著述甚富,刊本有《赌棋山庄文集》7卷、《文集续编》2卷、《文集又续编》2卷、《赌棋山庄诗集》14卷、《酒边词》8卷、《赌棋山庄余集》8卷、《赌棋山庄词话》12卷、《词话续编》5卷、《说文闽音通》2卷、《课馀偶录》4卷、《课馀续录》5卷、《围炉琐忆》1卷、《藤阴客赘》1卷、《稗贩杂录》4卷、《校刻东岚谢氏诗略》4卷。另有若干稿本存世。谢氏在诗、词、文、经学等方面均有建树,尤以词学批评得享盛名。谭献评其学曰:“闽中学人可以称首”。^[1]兹撷其词学思想之菁华,稍作引论,论及谢氏论词之主旨、阐释之主张、地域词史之建构,其他则从略。

《赌棋山庄词话》及其《续编》刊于光绪十年(1884),篇幅甚巨,内容多记词坛掌故,收集词人词作,故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论词精义。然谢氏在同治十年(1871)作《答魏秀仁书》中论及魏氏《陔南山馆诗话》时说:“大著弟已粗览一过,比前较精、较结,《诗话》精神尤团结,但采诗颇多,然亦无碍宏旨。”^[2]可见谢氏撰词话自有“团结”二字在心,需要论者进行阐发。此“团结”指主旨,即众多材料必须围绕一个中心来演绎安排,颇似今天我们论散文常说的“形散而神不散”之“神”。方智范等《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主要论及谢氏折衷浙、常二派的治词途径、诗词同源说,兼及谢氏的词史观、性情说、养气说、声律说等内容,并认为谢氏撰写词话的目的是在寻觅道、咸词坛失落已久的“词之真种子”(据文义,“词之真种子”殆即“忧生念乱”的涉世词篇)。这些大抵不差,可惜他们未能深入开掘,于谢氏论词主旨及其意义仍不够明晰。笔者认为词量说才是谢氏独具开创性并极具批评意义的词学理论。

欲明词之“量”,先说人之“量”。谢章铤《刘芑川〈东洋小草〉序》说:“且夫水之载物,以物之轻重为量,重者见深,轻者见浅。维人于世亦然。量至于是,见至于是;言至于是。”^[3]人是创作主体,量至之人虽不一定能作量

至之词，但量不至之人绝少能作量至之词。此人之“量”即指人的器量、胸襟、怀抱、品格等等，故谢氏反复讲词家要养气。谢氏生活的时代要求词家更有“量”，他一生经历了道、咸、同、光四朝，鸦片战争、太平军起义、义和团运动、中日甲午战争等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使生活在这个时代尤其是道、咸两朝的词家蒙受巨大的苦难。他在《词话续编》卷三中说：“余尝欲辑丧乱以来各家吊亡悼逝诸作，都为一集，言者无罪，闻者足鉴，传诸檀板，以警将来。是以《小雅》告哀之义，而当局者所宜日置之座右也。”^[4]此言即是受到时代的激荡而产生的诉求。然道、咸以来有些词家的创作仍然守着香软柔弱的词风，积习难改，而词学理论仍有人在倡导清空醇雅、比兴寄托，显然已不是时代的需要。

谢氏指出：“予尝谓词与诗同体。粤乱以来，作诗者多，而词颇少见。是当以杜之《北征》、《诸将》、《陈陶斜》，白之《秦中吟》之法运入减偷，则诗史之外，蔚为词史，不亦词场之大观欤？”^[5]论者常据此说谢氏的论词主旨是“诗词同体”，而“诗词同体”是常州词派的认知，不能见出谢氏论词的创造性。又有论者反复申说谢氏的论词主旨是他的“词有史”的观点，然周济已先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6]谢氏同时代的词家谭献也在《篋中词》、《篋中词续》中屡用词史观评词，故词史观也很难说就是谢氏最有特色的理论。值得注意的倒是谢氏解决了如何做到词有史的问题，即用杜甫、白居易作诗之法去作词，这样可以做到词有史。如此，要了解什么是词有史，必先了解什么是诗有史。

“诗史”二字最早出自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7]意谓杜诗即是社会史。然而，诗毕竟不同于史书，它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故宋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8]意谓杜诗于社会史一义之外又别有心灵史之义。词可以是社会史的词，也可以是心灵史的词，从诗言志、词言情的传统来看，词似乎更应该是心灵史的。虽然香软柔弱的词可据以考察词人的心灵史，但因其不过多涉及时事，故难以据以考察社会史。又由于有比兴寄托的作词法则在，使得词作稍涉及时事，必用曲笔弱化之，抒情主体被隐藏了，读起来好像总是觉得词意隔了一层。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疑问：词之“寄兴深微”^[9]的体性特征及配套的比兴寄托作词法则，在干戈满天的时代，真的能够承担自身的使命吗？

时代要求词学理论的突破。谢氏说：“惜填词家只知流连景光，剖析宫调，鸿题巨制，不敢措手，一若词之量止宜于靡靡者，是不独自诬自隘，而于派别亦未深讲矣。”^[10]不难见出，谢氏认为鸿题巨制才有“词之量”可言。“鸿题”自是大题目之意，“巨制”非指词之篇幅，而是指词有足够的时空容量，如他评于阆

《唱晚词》：“地则金陵、维扬等处，人则向荣、张嘉祥、邓绍良、袁甲三诸大帅，皆见于篇，虽其词未必入胜，然亦乱离之时能词者应有之言。但所填只此《满江红》十数阕，其余则仍是栽花饮酒闲生计，未尽量也。”^{〔11〕}可见，词量即是词之容量。“地则金陵、维扬等处”，已不是词中常见亭台楼阁的空间容量；人则向荣诸大帅，已不是词中常见吟风弄月之人；事已不全是栽花饮酒闲生计，而是多了戎马疆场平天下，如此从人、地、事诸方面着手就能扩大词的容量。词量一词是谢氏倡导作词要“敢拈大题目出大意义”^{〔12〕}的观点的形而上表述，更有理论色彩，其指向即是词要写重大时事，多写重大时事就可更好地展现历史。在谢氏词话中，词量说成为品评清代词人词作的一条最重要的标准，有量之词人，谢氏无不网罗，如黄景仁、蒋士铨、林则徐、邓廷桢、刘家谋等。谢氏主盟的聚红榭词人的词作也多涉及时事。^{〔13〕}

时人作词未尽量，很大原因是词人的传统习性使然。谢氏指出：“词之兴也，大抵由于尊前惜别，花底谈心，情事率多，袭近数传，而后俯仰激昂，时有寄托，然而其量未尽也。故赵宋一代作者，苏、辛之派不及姜、史，姜、史之派不及晏、秦，此故正变之推未穷，而亦以填词为小道。若其量之，只宜如此者。”^{〔14〕}按传统习性作词，不但使词的容量狭小，还会导致对词家的评价不当。鉴于此，谢氏论词毕生倡导学苏轼、辛弃疾。^{〔15〕}他还从词之源与流两方面引导人们对词量的注重，有说：“夫词之源为乐府，乐府正多纪事之篇；词之流为曲子，曲子亦有传奇之作。”^{〔16〕}也就是说，作词纪事断断可行，非只抒情一途。多纪事，多写时事，多写重大时事，就可以做到“夫词固有词之量矣”。^{〔17〕}

时人作词未尽量，还有现实的原因，这就是风气坏透了。“耳食之徒或袭其（指国初诸老）貌而不究其心，音节虽具，神理全非，题目概无关系，语言绝少性情，未极终篇，废然思返，岂按吕协律之作必为是味同嚼蜡而后可乎？”^{〔18〕}此语是针对浙派末流只讲形式不讲内容而发的。此外，清代嘉庆以后词坛已为常州派牢笼，谢章铤虽颇赏此派推尊词体之功，但也深厌其以比附说词，其原因一是不满意此派解词如同猜谜的做法，二是不满意此派作词讲比兴寄托却不能直接明了地反映现实。常州词派理论的基石即是“意内言外”说，谢氏却说：“是盖乾嘉以来，考据盛行，无事不敷以古训，填词者遂窃取《说文》，以高其声价。殊不知许叔重之时，安得有减偷之学，而预立此一字为晏、秦、姜、史作导师乎？郢书燕说，众口一词，何为也？”^{〔19〕}因为“意内言外”说对于词学批评来说，容易导致评论偏离词之本意，而对于指导作词来说，又容易导致词作不直接写时事，均与“词之量”无甚益处，故谢氏有所不取。

谢氏的词量说在清词史上意义甚巨。对清词卓有研究的严迪昌先生在《清词史》中引证谢氏词话最多，也最认同谢氏的观点，包括对“词之量”的注重，举凡谢氏重点介绍的以词写时事有成就的词家，严先生基本上都安排篇幅

予以探讨。清词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它早已是不能合律歌唱的诗体,故首先面临如何反映现实的巨大任务。从这层意义上说,词量说的意义不低于寄托说、沉郁说、重拙大说。因为后三说虽在一定的程度上倡导涉世,但其注意的中心仍在词的艺术层面,且深受传统诗学批评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词量说最能代表谢章铤的词学理论成就。

二

清代词学以常州词派鼻祖张惠言的《词选》影响最大。谢章铤对张氏的词学观屡有论述,表达出自己的独立的见解和一定的困惑。他的困惑固是他的词学阐释观的局限所致,但带给我们的思考意义却是不小的。

谢章铤是在咸丰十年(1860)年末读到张惠言《词选》的,这本书是他的朋友梁鸣谦从京师带给他的,那一年他四十一岁。因为对这本书的解读,遂形成其词学观中精彩的内核。首先,他对《词选序》重寄托、尊词体给与很高的评价。他说:“礼堂自京师归,出皋文《词选》示余。余读之曰:‘此词家正法眼之作也。’”^[20]又说:“相其微意,殆为朱、厉末派恒订涂泽者别开真面,将欲为词中之铮铮佼佼者乎?《续选》凡词五十二家,一百二十二首,则翰风外孙董子远毅所录,以补前选之遗,亦肄业之善本也。”^[21]又说:“皋文《词选》诚足救此三蔽(笔者注:淫词、鄙词、游词)。其大旨在于有寄托,能蕴藉,是固倚声家之金针也。”^[22]正是因为重寄托可以医治浙派末流不重立意之病,谢章铤推之为“肄业之善本”、“词中之铮铮佼佼者”、“倚声家之金针”。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认识到张氏尊词体的用心,有说:“是故皋文以寄托论词,山阳潘四农以人品论诗,皆诚为能尊诗词之体者。”^[23]甚至希望词能与六义并列,有说:“宋人咏物,高者摹神,次者赋形,而题中有寄托,题外有感慨,虽词实无愧于六义焉。”^[24]他进而要求通过读词以精求六义,有说:“昔竹垞撰《词综》,以雅为宗,读《词综》则词不入于俚,读皋文此《选》则词不入于浅。且使天下不敢轻易言词,而用心精求于六义,皋文之有功于词,岂不伟哉!”^[25]这些见解与我们今天对《词选》的认识基本无差别,而他在一百多年前即已提出。

但谢章铤对张氏词学观更多的是持批评的态度,主要原因是张氏用比附说词的方式容易导致对词作本意理解的偏离,甚至为寻求词中寄托而不惜曲解词作。这确实是一个困扰词学阐释学的问题。他虽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说,但其探索精神及引起的思考值得关注。

首先,他表现出对词作本意的注重。如说:“虽然,词本于诗,当知比兴,固已。究之,尊前花外,岂无即境之篇,必欲深求,殆将穿凿。夫杜少陵非不忠

爱，今抱其全诗，无字不附会以时事，将《漫兴》、《遣兴》诸作，而皆谓其有深文，是温柔敦厚之教，而以刻薄讥讽行之，彼乌台诗案，又何怪其锻炼周内哉？即如东坡之《乳燕飞》，稼轩之《祝英台近》，皆有本事，见于宋人之纪载。今竟一概抹杀之，而谓我能以意逆志，是为刺时，是为叹世，是何异读《诗》者尽去小序，独创新说，而自谓能得古人之心？恐古人可起，未必任受也。前人之纪载不可信，而我之悬揣，遂足信乎？故皋文之说不可弃，亦不可泥也。”^[26]他甚至以自己的亲见之事来否定对词作的曲解，并提出“虽作者未必无此意，而作者亦未必定有此意”^[27]的见解。如说：“今一遇稍有感慨之词，便以为指斥时事，愁禽怨柳，塞满乾坤，是直以长短句为谤书矣。夫岂其然？昔吾友刘赞轩勣曾作《咏尘》词云：‘帘前几阵狂风，登楼一望迷南北。蒙蒙骤起，纷纷自扰，斜阳欲黑。舞榭灯昏，妆台钗冷，模糊春色。叹遮来难觅，扫来仍聚，染双鬓、谁人识。无赖青青垂柳，又愁痕、雨边暗织。半黏去马，半随流水，销魂行客。十斛量愁，千重疑梦，青衫泪湿。好拂衣归去，低徊明镜，把朱颜惜。’（原注：《水龙吟》）无锡丁杏舲绍仪采入《听秋声馆词话》，疑为慨时之作。其时粤匪披猖，闽中大警，赞轩非无忧愤之篇。而此词则实因朝云在殡，柳枝不来，感逝伤离，所遭辄不如意而作，无关时事也。夫以同时之人，踪迹未密，尚难揣其用意之所在，而况在千载百年以上乎？”^[28]刘勣是其挚友，鉴于此，人们容易相信谢章铤关于《咏尘》词的见解乃是符合词作本意的解读。当然，这种自我作证的阐释方式不符合阐释学的一般规则，因而其说仍不够令人信服。

其次，谢章铤试图从张惠言《词选序》的理论依据层面去寻绎比附说词的弊病根源所在。张惠言词论的理论依据即是“意内言外”，如何看待这一依据呢？谢氏说：“有通套语、门面语，流传习用，且若奉为指南，而不知其与本义不相酬者。如近人论词，辄曰：‘词者，意内言外。’按：此语本于《说文》，然此特大徐本耳，若小徐本则作‘意内音外’。音外者，古之所谓语助，今之所谓虚字也，故经传于助句之字，辄训曰‘词’。若，几词也；于，叹词也；云，语已词也；其，问词之助也。此类多矣！夫‘意内言外’，何文不然？不能专属之长短句。苟为‘意内音外’，则倚声者将专求虚义，专讲馀腔，若古乐府之‘沦淳’、‘妃呼豸’之类，令人不可解乎？且今之称为能手者，不以作意见奇，而以知音自诩，是直‘音内意外’矣，更与古义不合。”^[29]东汉许慎释词为“意内言外”，在乾嘉考据盛行的背景下，深通《易经》的张惠言很容易将其拿来解释作为词体之词^[30]，谢章铤看到了这点。然谢章铤毕生治经，对《说文》下过很深的功夫，尤重小徐（徐锴）本《说文》，认为小徐对词的解释更可信，遂以小徐“意内音外”去替代大徐（徐铉）“意内言外”的解释，企图从根本上抽去张氏词学观的理论依据，为消去比附说词打下基础。^[31]应该说：这一努力很难达到预期效果。谢章铤对“意内言外”说本有精妙的把握，他说：“词虽小道，难言矣。与诗同志而竞诗焉，则

亢；与曲同音而竟曲焉，则狎。其文绮靡，其情柔曼，其称物近而托兴远且微，骤聆之，若惘恍缠绵不自持，而敦挚不得已之思隐焉。是则所谓‘意内言外’者欤？”^{〔32〕}这是从词之“寄兴深微”体性特征来体认的，正因为这一特性是词体最根本的特征，所以“意内言外”的阐释方式是可以大行其道的，很难被否定。谢章铤所主张的“意内音外”更接近的是词的形式特征，而不是体性特征，因而很难说比“意内言外”更适合去解读词作。这点，连谢章铤本人都保持清醒的认识，他本认为“词以声为主”^{〔33〕}，因此过于重视声（音），就会“专求虚义，专讲虚腔”，“第以虚腔见美”，则立意愈去愈远矣！然而这样一来，他则一时显得不能自圆其说，也显示出他的困惑所在。我们认为声音最真实记录意义，其意义在于你如何透过声音去理解。这只是从一般层面去理解言意关系，而未切合词之体性特征。在言意关系不好处理的时候，谢章铤的选择是：“词也者，意内而言外者也。言胜意，剪彩之花也；意胜言，道情之曲也。固与其言胜，无宁意胜，意胜则情深。”^{〔34〕}他的《酒边词》的确深于情。

周济、谭献的词学思想行世后，谢章铤的词学阐释观又有新的开拓。谢章铤光绪壬午（1882）作《词辨跋》云：“持论（指《词辨》）创而确，大可开拓眼力。其选录大意则本于皋文张氏。皋文之论词，以有怀抱有寄托为归，将以力挽淫艳、猥琐、虚枵、叫呶之末习，其用意远矣！虽然，词以温尉为大宗，温尉之诗靡靡，以彼怀抱较之李、杜，不待智者而知其不似也，而谓其词皆遐稽隐讽字字有着落，或不然也。诗三百，一言以蔽曰：‘思无邪’。吾谓词不尽有托，而能以有托之心读之，则有托矣。”^{〔35〕}此言可以看出是对周济寄托说的反省，应该说这是很实际的体认。此后谢章铤在光绪十年（1884）刊行《词话续编》中正式提出“虽作者未必无此意，而作者亦未必定在此意”的见解，似是针对谭献《复堂词录叙》所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而发的。^{〔36〕}谭氏之言，清初王夫之说过类似的话：“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37〕}四库馆臣也说过：“当其独契，不必喻诸人人，并不必印诸著书之人。”^{〔38〕}因而谭氏理论显得缺乏创新。谭、谢有交往，谢氏说谭氏“修辞之功与予派别不同”。^{〔39〕}相对于前期坚持根据词作本意释词的观点，“以有托之心读之则有托”的观点提出，一定程度上有认同读者自由阐释的一面。“虽作者未必无此意，而作者亦未必定在此意”的观点的提出，又有坚持按词作本意释词的意味。相较而言，“以有托之心读之则有托”显得更可贵。既认为“词不尽有托”，又承认读者在读词时可以“以有托之心读之”，如此词中的寄托则可以出自读者的理解了。今天的阐释学主张在阐释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切合事实，一方面要张扬主体阐释的自由。

三

在《赌棋山庄词话》及其《续编》共 252 则条目中,有 67 则论及闽人词作和轶事,如若单将这 67 则词话析出另编,就是一部相当可观的《闽中词话》。这说明:谢章铤有浓厚的地域词学的建构意识。这一点在晚清词学批评家中无人能出其右。

在 67 则论及闽人闽词的词话中,谢氏论宋代闽籍词家 2 人,明代闽籍词家 7 人,清代闽籍词家 56 人,有的词家是一再论及,多达 3 则。可见谢氏地域词学建构的重点实在清代闽籍词家词作,这些词家中有 32 人与谢氏有交往。谢氏一生爱好游历交往,以真情交友,门生故旧遍及大江南北,其中不少人爱好作词,这为谢氏编纂词话提供了充足的取材资源。这是谢氏词话多论及乡邦词人词作的客观原因。另有作为一代词学家的谢章铤其个人词学修养的原因。

首先,谢氏有强烈的建构地域词史的意识。他说:“吾闽词家,宋元极盛,要以柳屯田、刘后村为眉目。明代作者虽少,然如张志道以宁、王道思慎中、林初文章,亦复流风未泯。又继以余澹心怀、许有介友、林西仲云铭、丁雁水炜、韬汝焯。雁水与竹垞、电发友善,其名尤著。近叶小庚太守申芎亦擅此学,著《词存》、《词谱》等书。”^[40]这就将自宋到清道光间的闽词发展线索清晰地勾画了出来。他又能看到明代闽词发展的不足,并对此表达了遗憾:“明代词学,譬诸空谷足音,而海滨朴习,更无有肄业及之者。”^[41]同时,他又对清初词学大盛,而闽中词家无能与陈维崧、朱彝尊等辈争雄表示了可惜。他说:“闽中词学,宋代林立,元明稍衰,然明人此道本少专家,昧昧者盖不独一隅。特怪国初渔洋、羡门、迦陵、竹垞诸老,南北提唱,一时飙发泉涌,电掣云屯,倚声一途,称为极盛。吾闽卒无特起与之角立者,即二丁勉强继响,顾附庸风雅,不足擅场。近时叶小庚太守著书数十卷,先型略具,宗风未畅。许秋史秀才用笔清秀,颇有姜、史遗风。其所刻《萝月词》,后半气体,比前半加宏,使培充磨礲,未必不转而愈上。天不假年,无由臻于大成,惜乎!”^[42]谢章铤正是在反省中去检阅词史,知道了闽籍词家的成绩与不足。

其次,谢章铤有意在理论上为闽词发展廓清障碍。闽人治词,原有顾虑。黄宗彝《非半室原刻词存叙》指出了原因:“以闽人每多蛮音鸟语,学焉不精;又以词为诗馀,体格晚近则不必学;又以词多男女言情之作,有伤风雅,则不可学。要皆闽人难视填词,而以数自藏其短,故元明以来,虽博士通儒莫不陷溺其说。若诗若文若经史,治者各足抗衡古人,而无以填词著于后。”^[43]诸种原因中认为闽音不适合填词尤为有害。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三载晋江(今属福

建)人林外(字岂尘),“尝为垂虹亭词,所谓‘飞梁遏水者’,倒题桥下,人亦传为吕翁作。惟高庙识之曰:‘是必闽人也。不然,何得以‘锁’字协‘埽’(扫)字韵。’已而知其果外也”。^[44]宋人叶绍翁《四朝文见录》也记载了此事。林外词因宋孝宗的猜测成功,一举得名。但发展到后来,这反倒成为闽人不宜填词的口实。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十八说:“闽语多鼻音,漳、泉二郡尤甚,往往一东与八庚、六麻与七阳互叶,即去声字亦多作平,故词家绝少”。^[45]类似丁绍仪这样的论调确有不少,在闽人的脑海中深深盘踞。不在理论上补偏救弊,闽词就难以得到长足发展。谢氏说:“闽中宋元词学最盛,近日殆欲绝响,而议者辄曰:‘闽人蛮音鸫舌,不能协律吕。’试问‘晓风残月’,何以有井水处皆擅名乎?而张元幹长乐、赵以夫长乐、陈德武闽县、葛长庚闽清诸家,皆府治以内之人,其词莫不价重鸡林,即林岂尘以‘锁’韵‘扫’,此乃用古韵通转,不得以《闻见录》之言而讥诮之也。且今之作词者,将协古乐乎?将协俗乐乎?若协古乐,则吾诚不敢知,若协俗乐,则今日乐部所演习者,大抵老伶伎师随口胡诌之言,何以抑扬顿挫皆可入听乎?古人词不尽皆可歌,然当其兴至,敲案击缶,未尝不成天籁。东坡‘铁板铜琶’,即是此境。作者不与古人共性情,徒与伶工竞工尺,遂令长短句一道,畏难若登天,不知皆自画之为病也”。^[46]这一论证可谓击中要害——如若闽音不适合填词,何以宋代闽词大盛?谢氏编刊《聚红榭雅集词》,特请擅长音韵学的挚友黄宗彝写序,并在《稗贩杂录》卷四中全文照录黄《序》。黄宗彝《聚红榭雅集词序》认为:“夫三代正音,吾闽未替,则以闽人填词,谐律固其余事。”并多方举例论证闽音利于填词,其有力证据是:“天下方音,五音咸备,独缺纯鼻之音,惟吾闽尚存,乃千古一线元音仅存于偏隅者。漳、泉人度曲,纯行鼻音,则尤得音韵之元矣”。^[47]这一说法相当有说服力。此虽为《雅集词》结集时所写的一篇序言,然以黄氏与聚红榭同人之密切关系看,则很可能是当日同人之间的一种共识。谢章铤为自己《酒边词》作《词后自跋》,叙述其二十一岁学词时,得知建宁许贻皋兄弟姐妹能度曲操管弦,艳羨之,惑于许氏所言“填词宜审音,审音宜认字,先讲反切则字清,遍习乐器则音熟,然其得心应手,出口合耳,神明要妙之致,非可以言传,亦非可以人强也。”数年之间不敢作词,后多读古人词,觉许氏之言有疑问,不宜盲从。有说:“夫词辨四声,韵书俱在,言语虽不同而四声则有一定。且今之传奇,往往一人填词,一人正谱,有自填之而不能自度之者,故宋人之词亦不尽可歌”。^[48]于是乃复填词。词至清代早已变成与诗一样可以抒情言志的诗体,斤斤拘泥于音声,怯步不前,无异于作茧自缚。特别是说“言语虽不同而四声则有一定”甚有道理,为操闽音者亦可填词,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和行之有效的办法:即据平仄四声去填,可有效地避开方言的干扰。

再次,谢章铤在以继绝响的责任感驱使下欲为闽词树立一帜。谢氏主盟

聚红榭以前,除高文樵、谢章铤二人以外,闽地鲜有寄意于填词者。稍前,闽籍词人除叶申芑较著名,词坛沉寂已七百余年。这一现状与两宋闽籍词人众多、名家辈出的繁盛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必得一、二才力与眼光超出流辈之人,专诣独造,集合群力、闽词才能振起。谢章铤适当其任,黄宗彝《聚红榭雅集词序》说:“枚如毅然拂众论,独于斯道有心得,且以词人多闽产,嗣续薪传,非我其谁?其自任之重如此。”正是赖其鸠合同党,长时间用功填词;又赖其倾尽心力,搜刻同人唱和之作,闽词才有中兴可言。谢氏作《词话》初稿后,就请同年友刘存仁作序,序十分契合谢氏以苏、辛为楷模的主张,谢氏感动之余回信表示感激。他说:“不揣狂妄,学填数十阕,于断绝寂寞之中,为吾闽永此一途。然愿甚奢,而才识俱不逮,秋蚓号穹,诚不足当大雅一哂。惟进而教督之,匡正之,则真为无穷之赐,且更望助我张目,于此道树立一帜,亦吾闽一大生色也。”^[49]正是振兴闽词这一责任感使得谢氏及其盟友词的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最后,谢氏出于对前辈典型的追慕和对同道词学活动的尊重,大量记载闽人词作,负起文献编辑的责任,大量词作因为谢氏的记载而为人所知。如叶申芑在道光十四年纂《闽词钞》,掀起地域词学文献编辑之风气,谢氏觉得有必要予以详细介绍,因而立专条讨论。有说:“叶小庚太守撰《闽词钞》四卷,始于宋徐昌图,终于元洪希文,附以方外、闺媛,凡六十一家,为词逾千首,闽中词人梗概具焉。昔者元《凤林书院诗馀》,厉樊榭谓可以溯江西词派,顾亦不尽豫章之人。至国朝《浙西六家词》、《荆溪词》、《四明近体乐府》,则皆专摭土风勒为一编者。小庚是书,存亡萃佚,其亦维桑之敬也夫?但此道宣究殊希,流传或滞,仍归寂寞。特略其姓氏于左,以资参稽。”^[50]李应庚、翁宗琳、刘家谋(部分)、刘琛、崔挺新、黄宗彝、叶滋沅、刘存仁(部分)、董庆澜、张承渠、高思齐、张见心、廖菊农、李涵亭、计荣村、叶甲三、潘联禧、陈星垣、薛幼臣、沈学渊、林煥、郑守廉(部分)、丁铸、黄燠、徐一鶚(部分)、陈遁祺、黄经、林天龄、王彝、石介的词作,因为谢氏的记载,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谢氏的辛勤辑录,另有为闽人留名的愿望。如他曾说:“大抵闽士不善为名,至闺阁有著述,尤秘匿不肯示人。惟青楼女子,时或以此钓奇,然亦从前风气偶有之,今则绝无矣。”^[51]可以说,写一部《闽词史》,总是饶不过谢氏词话的记载,当然,他的记载仍只是清代闽词的一小部分。

谢氏有丰富的词学思想,论述涉及很多领域,如其对词之音律、情感、立意的讨论,也很有见解,时贤论述已多,在此不具论。

注释:

[1]《复堂日记》卷一,清光绪间仁和谭氏刻《半厂丛书续编》本。

[2]林公武主编《二十世纪福州名人墨迹》第1~3页,福建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此《书》作年据陈昌强先生《谢章铤年谱》考证,参陈庆元先生主编《谢章铤集》第834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

[3]《赌棋山庄文集》卷一,清光绪十年(1884)南昌刻本。

[4]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

[5][10][11][16][41]《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

[6]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63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7]明正德嘉靖顾氏夷白斋刻《顾氏文房小说》本。

[8]杜甫撰、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二十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王国维《人间词话》,民国十六年(1927)海宁王氏《王忠愍公遗书》铅印本。

[12]《赌棋山庄词话》卷八,清光绪十年(1884)南昌刻本。

[13]参刘荣平《聚红榭唱和考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4][17][18][33]《赌棋山庄文集》卷五《与黄子寿论词书》。

[15]郭则沄《清词玉屑》卷八:“赌棋词主苏、辛。”民国二十五年(1936)蛰园校刊本。

[19][29]《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五。

[20][25]《赌棋山庄文集》卷二《张惠言〈词选〉跋》。

[21][22][26][27][28]《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一。

[23][35]《课馀续录》卷四,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福州刻本。

[24]《赌棋山庄词话》卷九。

[30]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说:“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清道光十年宛邻书屋刻本《词选》。)论者认为“传曰”之传指《周易孟氏章句》。张德瀛《词征》卷一曰:“词与辞通,亦作词。《周易孟氏章句》曰:‘意内而言外也。’……《周易章句》,汉孟喜撰。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事迹具《汉书·儒林传》。喜与施雠、梁丘贺同受业于田王孙,传田何之《易》。世以‘意内言外’为许慎语,非其始也。”(《词话丛编》第4075页。)不过,张惠言也说过其以“意内言外”释词是借用了《说文》。陆继辂《崇百药斋续集》卷三《冷秋馆词序》谈到他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初习倚声时,张惠言对他说:“词故无所为苏、辛、秦、柳也,自分苏、辛、秦、柳为界,而词乃衰。且子学诗之日久矣,唐之诗人,四杰为一家,元、白为一家,张、王为一家,此气格之偶相似者也。家始大于高、岑,而高、岑不相似;益大于李、杜,而李、杜不相似,子亦务求其意而已。许氏云:

‘意内言外谓之词。’凡文辞皆然，而词尤有然者。”（清道光四年合肥学舍刻本。）所以说张惠言以“意内言外”释词是借鉴《说文》并未有多大的不妥。

[31]《赌棋山庄文续》卷一《答张玉珊》：“自有《说文》二千年来，真面不得见，唐本既已失传，传者止大、小徐二本。大徐摹刻者多，举世盛行；小徐直至乾隆中叶始显，而其势不敌大徐，考订家直倨之《玉篇》、《字林》、《广韵》、《集韵》之中，以备字书之一种。夫《说文》真本既不得见，大、小徐俱治说文，似不宜有所轩轻，况大徐学不及小徐，其定本多从小徐之说而有时反失其意，故欲于二本参稽同异，庶可窥《说文》之真于万一否？”（清光绪十八年福州刻本。）谢章铤撰有《说文大小徐本录异》1卷，稿本，国家图书馆藏。经目验，未见小徐本则作“意内音外”之记载。徐锴著有《说文解字系传》40卷、《说文解字篆韵谱》5卷等。民国刻《四部丛刊》景述古堂景宋钞本《说文解字系传》通论下卷三十五：“词者，音内而言外，在音之内，在言之外也。何以言之？惟也、思也、曰也、兮也、斯也，若此之类，皆词也，语之助也。”则宋钞本小徐《说文》实作“音内言外”，非“意内音外”。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引证文献时每多改动原文，有时也凭记忆去组织材料，因此，“意内音外”云云有可能是谢氏据小徐本《说文》所作的改动，也有可能是谢氏记忆有误，但也不能排除谢氏所看到的小徐《说文》版本确有作“意内音外”的。只是宋本小徐《说文》在《说文》系统中的权威性，似不容置疑。

[32]《赌棋山庄文集》卷一《叶辰溪〈我闻室词〉叙》。

[34]《赌棋山庄文集》卷二《〈双邻词钞〉序》。

[36]谭献《复堂词录序》见清光绪间仁和谭氏刻《半厂丛书续编》本《复堂文集》卷一。据李剑亮《论丁绍仪对谭献词学阐释论的影响》一文，谭献的这一观点是从丁绍仪的观点“作者不宜如此，读者不可不如此体会”发展而来的。（《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其说完全可信。丁氏，江苏无锡人，长期宦游闽、台。丁氏观点见其《听秋声馆词话》卷二十。《听秋声馆词话》于同治八年（1869）九月刊于福州，多记闽、台词人词作。谢章铤撰《赌棋山庄词话》曾广泛参考过丁氏《词话》。谢氏的话，出现在《词选》引录鲋阳居士曲解东坡《卜算子》语之后，但随即提到丁绍仪曲解刘勰《咏尘词》，比较丁氏和谢氏的话，不难看出谢氏之言是为了驳正丁氏之言而说的。再比较谢氏和谭氏的话，在行文语气和方式上，谢氏的话更接近谭氏。这从“作者”、“未必”、“何必”三个用词上可以看出。谭献《复堂日记》卷一：“访长乐谢章铤枚如。此君于经籍、金石之学均有本末，闽中学人可以称首。”此事发生在同治二年（1863）三月，这是谭、谢交往的最早记载。（参本书附录“谭献评《聚红榭雅集诗词》”条）据徐彦宽辑《复堂日记补录》卷一，谭、谢二人再见面是在同治十年（1870）。《补录》记同治十三年（1874）谭氏在京赴礼部试时说：“入场。邻号适晤长乐谢枚如同

年，不相见又三年矣。矮屋促膝为乐。”（民国二十年《念劬庐丛刻初编》铅印本。）以后未见谭、谢再见面的记载。而据《复堂词录叙》徐珂按语：“书（指《复堂词录》）成于光绪八年（1882）九月，未刊行，师归道山矣。”从1863年到1882年，计20年时间，在这20年里谭献有可能对人讲起自己的观点。谢氏是否看过或听过谭氏的观点，不得而知。谢氏《词话》及其《续编》刊于光绪十年（1884），从时间来说，谢氏有可能获知谭氏的观点，而谢氏和谭氏都曾注意到丁氏的观点，这是无疑的。

〔37〕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一，民国上海商务印书馆刻《四部丛刊》景《船山遗书》本。

〔38〕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几何论约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

〔39〕《课馀偶录》卷三，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福州刻本。

〔40〕《赌棋山庄词话》卷一。

〔42〕〔50〕《赌棋山庄词话》卷四。

〔43〕黄宗彝《非半室词存》卷首，民国十年（1921）铅印本。

〔44〕明正德刻本。

〔45〕清同治八年（1869）刻本。

〔46〕〔49〕《赌棋山庄词话》卷五。

〔47〕谢章铤辑《聚红榭雅集词》（卷1~2），清同治丙辰（1856）福州刻本。

〔48〕《赌棋山庄文集》卷三。

〔51〕《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二。

校注例言

一、本书以清光绪十年刻本《赌棋山庄词话》及其《续编》为底本进行校注。词作按《词律》、《词谱》断句标点，诗、曲、文、赋等则按现代通行规则断句标点。本书基本不变动谢氏词话的段落安排，少数段落变动则予以说明。繁简字转化据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不作类推简化，适当保留繁体字。原文误字不改，在其后用〔 〕标出正确用字。本书重视对谢氏词话的正确判读，如疑而不能明者，尽力在覆核引文的基础上予以判读。

二、本书《附录》据晚清民国间刊行的《赌棋山庄文集》、《文续》、《文又续》、《赌棋山庄诗集》、《酒边词》、《赌棋山庄笔记合刻》等进行辑录，兼采谢章铤存世稿本。

三、本书力图逐一覆核谢氏词话所引原文，如词话引文改动较大，则照录原文；如改动不大，则出校记说明，以求相互对照。所取校版本，尽可能选择光绪十年前刊本。若一书有数种版本，取与谢氏词话引文最近的一种对校。少数版本则据光绪十年后影印本或点校本。

四、本书所引文献第一次出现时指明作者、文献名、卷数或页码、版本，以下再次引证，只指明文献名、卷数或页码，书名相同者分别指明作者。

五、谢氏撰写词话重点参考的他人词学著作，如杨慎《词品》、沈谦《填词杂说》、徐钊《词苑丛谈》、彭孙遹《金粟词话》、毛奇龄《西河词话》、李调元《雨村词话》、郭麐《灵芬馆词话》、许宗彦《莲子居词话》、王士禛《花草蒙拾》、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江顺诒《词学集成》等，如观点相同或相似，则引证诸词话，以见源流；如后出之词话或词学研究著作，有与谢氏词话观点相同或相似，则酌采之，以见影响。

六、谢氏词话间有不指明出处，或不详细指明出处，本书一律予以详细说明。少数不能指明的出处，暂付阙如。本书重视谢氏词话的辑佚价值，凡在存世文献中最早出现于谢氏词话的诗、词、文、曲、赋等作品则予以说明；谢氏稿本和朋辈间往还的纸札，尽力蒐求，如能访获，则说明存于何地，并与谢氏词话对校。

七、谢氏词话出现判断失误或结论错误，本书逐一辨明。

八、谢氏词话涉及大量作者，若为人熟知，只作简单介绍，并指明依据；若

不为人所知，则尽力考证，作较详细介绍，亦附依据。

九、本书每小节标题参考了《词话丛编》本，但按统一规则进行更改，如一律采用人名，不采用字号；书名采用全称，不采用简称等；亦多有据文意重新拟题者。附录中小节标题则是笔者自拟。

十、本书对词学专门术语、不容易理解的词语作简明诠释。